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

御製詩文十全集

(清)高宗

御製詩文十全集

顧建龍題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

御製詩文十全集

三十二開精裝一冊

(清)高宗

顧

問吳豐培

主

編拉巴平措
陳家璣

責任編輯王哲卿

編輯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出版 中國藏學出版社
印刷 北京市大興縣古籍印刷裝訂廠

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二〇〇

書號 ISBN·7-80057-117-3/Z·67

定價四〇元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

中国藏学出版社

顧 問 吳 豐 培
主 編 拉 巴 平 措
責任編輯 王 哲 卿
陳 家 璣

一九九三年十月

前言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是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的三种藏学史料丛书之一。原名《西藏研究丛刊》，遵照藏学界朋友的建议，自第二辑起改用今名延续出版。另外两种丛书是《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和《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汇刻》有线装和精装缩印两种版本，《别辑》为线装本。这些书自一九八一年陆续编辑付印，迄今已成书四十多种三百余册。

《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史料十七种，已成书的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和《西藏春潮》共六种。此外，还将选入几种民国时期的藏事史料，其中包括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与《海藏纪行》、刘曼卿著《康藏轶征》、黄慕松著《使藏纪程》、吴忠信著《西藏纪要》、朱少逸著《拉萨见闻记》、唐柯三著《赴康日记》、李明渠著《筹藏政策》、妙舟著《蒙藏佛教史》和李翊灼著《西藏佛教史》等。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捣乱破坏，藏地连年多事，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空前复杂激烈。其间入藏官员、学者和僧人，为维护领土主权，密切民族关系，据亲身见闻，或据历史文献纷纷著书立说，或向世人介绍藏情，或探讨禦外治边政策，其数不下数百种。《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著述，我们将在今后次第择优选入各辑。

编印这部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当代学人和民族工作者提供方便，为后世保存文献史料。

藏学汉文文献史料相当丰富，有人估计约千种左右，为数仅次于同类藏文文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以往从未经过系统整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中，各家收藏有多有少，未听说那一家的收藏是齐全的，使用极为不便。一些前期出版的古籍，大都老化变质，触手纷纷碎落，已不堪用；数以万件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的稿本，

正在不断散失，急待整理成书。因此，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需要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

起初，《丛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西藏的藏学研究者和在藏工作人员，现在它已行销全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对我们是鼓励，也是鞭策，将督促我们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并做得好一点，为国内外藏学界多做些服务工作。近年来，海外对西藏的议论颇多，遗憾的是，有不少说法距离西藏的实际甚远，甚至完全颠倒是非。这些人如能摒弃偏见，认真读一点可信的材料，再实地考察一番，就会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的丛书有助于海外学者和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了解西藏，有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助于藏学的发展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将是一大事。

《丛书》是一部资料书，编纂这类资料丛书，我们主张力求其全，力

求准确，力求有用。只要是较有史料价值的藏学文献，我们都准备编入《丛书》，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部史料较为完备的藏学工具性图书。《丛书》拟收录的文献史料约百种左右，要全书成编，还需要做不少事情，也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完。

在个别藏学家眼里，整理藏学文献是难入藏学研究之流的，这番话已绕耳数年而不去，可见是决心要影响我们的。但离开文献史料，专家又立足于何地？世上人多，各有所好，我们干上这一行，至今不悔，但不悔，而且郑重表示：我们立志为国内外藏学界当资料员，还要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

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牛力耕于北京

重印《清高宗诗文十全集》前言

清高宗即历史上著名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一七一——一七九九）。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代皇帝，在位六十年，退位之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仍幕后把持国政，实际操国柄六十三年，是我国历史上掌握政权时间最久的皇帝。在其执政期间，我们多民族的国家空前统一和发展，清王朝也达到了其历史发展的颠峰，旧史称『康乾盛世』。但其晚年，政治腐败，国力衰微，清王朝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巨大历史转折。

在其执政期间，有十次大的战事，他都曾亲自策划、指挥，因而自诩为『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受廓尔喀降，合为十』^①其中，除台湾、缅甸、安南之役外，其余多次战事，均与藏事有关，故此将此书重印，以供藏学研究者参考，也为研究其他有关问题的学者提供方便。这主要是考虑到它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第一，它保存不少《清高宗实录》等清代官书或缺或略的具体史料。乾隆有诗癖，政务、游玩之余，常以写诗自娱，保存在他的诗文集集中的

就有四万余首。单纯从数量来说，可算得我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不过，「诗多好的少」，真正艺术性高、可称其为诗的，却寥若晨星。但是，乾隆的诗有其独特之处，就是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大至战争、政治变动、权力斗争，小至天气、吃喝等，巨细无遗，均以之入诗。在诗的夹注中，罗列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战争的详细经过。而这些，则往往为《清实录》等清代官书或缺或略。例如，乾隆末年廓尔喀两次侵藏的原因，一般的说法是因为相互贸易中，西藏地方当局加重税收和食盐掺土等问题，这在《清高宗实录》中也多次提到。直到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清政府才从前驻藏大臣保泰的奏报中得知，已故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勾引廓尔喀滋扰后藏之事。乾隆愤懑地指出：「沙玛尔巴与仲巴呼图克图何以兄弟竟若仇讎，此语究系得自何人，总未据保泰奏明。沙玛尔巴与伊兄仲巴旧有仇隙，竟敢勾引廓尔喀滋扰后藏，以泄私忿，甚为可恶」^①。在《清高宗实录》此后几年的记载中，有抄没沙玛尔巴家产等事，但此事件的具体原因和经过，均不甚明瞭。乾隆在其《札什伦布庙志事》诗的夹注中，对此则有详细说明：

「庚子年（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引者）班禅额尔德尼来覲，朕赐予已为优厚。其由草地行走，沿途各蒙古及在京王、公、大臣等，布施财币，

更属不赀，总计当值数十万金。乃班禅额尔德尼既在京圆寂，若其徒仲巴呼图克图、岁琿堪布等，于还藏后酌量施舍各大寺庙，及看守后藏之番兵，则人心悦服，即沙玛尔巴系班禅胞弟，亦当酌量分贍，自不致垂涎窥伺。其前藏之戴琿、第巴等，及唐古忒番兵，亦必共相护卫。又何至有沙玛尔巴唆使贼匪来滋扰抢劫之事。盖仲巴、岁琿二人不免利欲薰心，且推原其意，总以卫藏皆系达赖喇嘛地方，惟札什伦布为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地，庙宇以外，非其所管，所有戴琿、第巴，皆达赖喇嘛所授，未免心存歧视，不复资给以结其心。即以佛法而论，亦当以布施济众为念，钱财币帛，为身外之物，俗家尚不可慳吝株守。况出家人本以空寂为教者乎？而乃见不及此，徒为贼匪所攘，慢藏诲盗，理有固然。又风闻沙玛尔巴教唆廓尔喀，谓伊与仲巴呼图克图俱系前辈班禅额尔德尼（指六世班禅——引者）同母兄弟，所有札什伦布资产，伊原属有份，可以到彼抢掠等语。沙玛尔巴挟嫌贪利，暗中唆使，实为此案罪魁，而仲巴呼图克图——闻贼至，不率众喇嘛竭力守御，乃携带细软，先期逃避，遂致济仲、札苍等复托占词惑众，以致众心离散，守御

无人，贼匪竟至占据庙宇，肆行抢掠，并将历辈金塔残坏，是以将为首之济仲，即令在彼剥黄正法，其余札苍，解京究治。至仲巴呼图克图，姑念其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兄，人本无能，拿解至京，免其死罪，已安插寺庙闲住。而巴都尔萨野及沙玛尔巴，不可不擒获正法，以示惩戒」^②。

乾隆在这里详述了沙玛尔巴与其兄仲巴争夺六世班禅遗产形成仇隙进而勾引廓尔喀扰藏的经过，以及西藏上层宗教人物的矛盾。类似这样的具体史料，在《清高宗实录》和清代其他官书中是很难见到的。

第二，乾隆在其诗的大量夹注中，引用了许多由前线发回的战报和封疆大吏的奏章，因而，对战争的详细经过和边疆地区的山川形势，往往都有详细说明，这也是在历史中不容易见到的。另外，乾隆的许多诗，都是由当时的大臣们捉刀代笔的。这些大臣们中，也有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代皇帝写入诗的夹注中，或者是乾隆直接引用了某些文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再加上自己的见解，直接写入诗中，因而具有研究参考价值。例如，在《悉故》一诗的夹注中写道：

「按藏地有前、后、中三处。卡木为前藏，即打箭炉察木多也。察木，即汉语之灵秀，多，即山石，其地山势峻拔，为帕克巴拉呼图克图所居之地；

卫者，为汉语之中，即布达拉大昭达赖喇嘛所居也，是为中藏；藏者，为汉语之净，又为善，即札什伦布庙，乃班禅额尔德尼所居，是为后藏。

在《福康安等奏西藏善后事宜，诗志颠末，得四十韵》这首诗的夹注中，他又写道：

『西藏，即古西吐蕃也。自唐至明，曰乌斯藏。其曰乌斯者，盖卫字之分书也。唐古特书法，凡整字下加以斯字，即读作危韵，如多斯为堆，挫斯为摧，则乌斯为卫矣。而唐古特语谓卫，则汉语之谓中；藏，则汉语之谓好也。今指其族曰图伯特，指其人曰唐古特。其地又分为三部，曰康，即察木多之地，为前藏；曰卫，即布达拉之地，为中藏；曰藏，即札什伦布之地，为后藏』^⑤。

这些，有些考据味道，不能笼统的认为『掉书袋』。它至少代表了当时的官方说法和认识水平，对于今天的藏学研究来说，仍不失参考价值。

第三，『诗言志』，乾隆写诗，当然有附庸风雅的意思，但当时主要不是

⑤ ④ ③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卷四十八。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卷四十七。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卷五十一。

为了发表，公诸社会，因而可以直抒胸怀，不必象官书那样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而加以种种掩饰，因而它反映了作者的许多真实思想。而乾隆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的思想、言行，对清王朝的决策、全国的政治，都有着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福康安等奏西藏善后事宜，诗志颠末，得四十韵》这首长诗里，他写道：「而达赖喇嘛，庇族兄弟陋，赏罚率弗公，受贿任分旧，或付噶布伦，或偏信左右」。

在自注中，他又写道：「向来藏中大小事务，均由噶布伦四人办理，而驻藏大臣，一切付之不问。数年前，公班第达因年老解退噶布伦后，其子丹津班珠尔袭职。达赖喇嘛愚暗无能，一任族中诸人及噶布伦主持其事。若辈倚势营私舞弊，复增税银，食盐掺土，种种侵扰边界，以致廓尔喀借词来犯边藏」。

在这里，乾隆毫无掩饰地说明了达赖喇嘛主持藏政的弊端，这类内容，虽然在《清高宗实录》里也可以看到，但是，公开指斥七世达赖「愚暗无能」的话，在《清高宗实录》等清代官书中是见不到的。击退廓尔喀侵藏战争之后，清朝制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核心是加强和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赋予其总揽藏政全权。这一重大政治措施的提出和制定，应该说是

和乾隆对七世达赖主持藏政造成的恶果极为不满。这种思想分不开的。这对研究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史料。

当然，对治学严谨的学者来说，还可以从中发现其他许多方面的资料价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部诗文集，可以作为乾隆朝的另一部『实录』读，也可以作为乾隆的『日记』读，还可以作为几次重大战役的『战史』读。

彭元瑞等人编完这部诗文集，是在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当时乾隆尚在位，故题为《御制诗文十全集》。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丛书集成》时，易名为《高宗诗文十全集》，今仍之，唯加『清』字，以明朝代。全书共收录乾隆有关『十全武功』诗一千五百十九首、文四十四篇。

张羽新

一九九四年五月

于北京沙滩红楼

注：①《十全记》，见原书卷五十三。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清朝第一次出兵伊犁，擒获最后一个准噶尔汗王，是为第一次准噶尔之役；不久，阿睦尔撒纳复叛，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清军再定伊犁，是为第二次准噶尔之役；翌年，南疆回部（维吾尔族）首领大、小和卓谋割据，清军迫